

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,曾国藩应该归入“非典型类清官”。也就是说,骨子里清廉刻苦,表面上和光同尘。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,不是做“清官”,而是做大事。

曾国藩:“非典型类清官”

曾国藩去世之后,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,生活一直不宽裕。曾国藩死后第五年,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,缺钱医治,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。左宗棠知道后十分感动,送了他三百两银子,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:“以中兴元老之子,而不免饥困,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。”就是说,这样一个官二代,有功之臣的后代,现在这样穷,可见曾国藩,确实是一个清官。

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,机会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,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。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,利息却非常高,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。据曾氏后人讲: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,后来卖到二万两,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;当时的社会,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,那就是富翁了。江西富商周扶九原本一介贫民,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。有一次,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。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,以盐票抵偿,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,不同意。周扶九当机立断,自己借钱拿下盐票。凭这几张盐票,他迅速成为富翁,后来身家多达4500万两。

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不许买盐票。按曾国藩当时的权势,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号,买上一两百张

盐票,是易如反掌的事情,而且并不违法。一张赚两万元,一二百张就是一二百万两。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。

曾国藩的清廉,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,不想让别人知道,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。薛福成拟的《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》中有这样一段: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,自持如寒素之人。所应得的养廉钱,都用于公务,自己不曾盖房买地。衣食都很俭省,每顿饭不过四样菜;儿女婚嫁,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,以此作为家训。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,灾民吃不上饭,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,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,来补充公款的不足。

这种叙述,应该是实事求是。综观曾国藩一生,其为官风格十分独特。一方面,他确实是一个清官。他的“清”货真价实,问心无愧。在现存资料中,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。他终生生活俭朴,“夜饭不荤”。晚年位高名重,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。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。但另一方面,曾国藩的轶事中缺少“贫不能殓”、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。在中国人眼里,真正的清官,必须“清可见底”,一尘不染,清到成为海瑞式的“白虐狂”或者“受虐狂”,才叫人

佩服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。

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,曾国藩应该归入“非典型类清官”。也就是说,骨子里清廉刻苦,表面上和光同尘。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,不是做“清官”,而是做大事。

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,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,只承认字面上规章制度,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。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,工资不够花,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,连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“轰动性事件”。

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,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,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。海瑞一清如水,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。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,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,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。

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。他刻苦自砺,全力内圣,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。因此,他做事更重效果,而非虚名。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出,一个人特立独行,必然为众所排斥。因此官场之中,行事过于方刚者,表面上似乎是强者,实际上却是弱者。所以,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,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。他的选择,远比做“清官”更复杂更沉重。(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)

曾国藩戒烟

曾国藩年轻时跟普通青年一样,爱上了吸烟。十七八岁,就被人称作“枪棍。”他吸的是那种湘人自产的草烟。农家人选择自家沙土栽种,用的是淘末灰、陈土砖灰、鸡粪灰等肥料种植,既恼、又辣、劲头足,吸上一口,比吃鸦片还过瘾。因为抽烟太滥,曾国藩受到了师长的训斥。自尊心很强的曾国藩,也知道抽烟百害而无一益,于是决心戒烟。为此,他还将自己原来的名字“子城”改为“涤生”,并发誓从此悔过自新,重新做人。但是,当时年少气盛的曾国藩,只是

雷声大、雨点小,一场口头革命而已,结果可想而知。

此后,又有几次,曾国藩极力想戒除它。誓也发了,烟壶也收了,别人敬的烟一概拒绝,并在烟友面前再三声明:“我戒烟了。”但一天过去,两天过去,一月过去,两月过去,终于敌不过久久萦绕在脑海中烟香的诱惑。没了它,眼皮好像睁不开了,写字、著文好像少了动力。饭菜、水果、香茗,什么到口里都少了个味道。睡到床上,更像丢了什么似的,怎么也睡不着。结果,在朋友的诱劝下,瘾

一上来,又抽开了。

道光22年的10月,曾国藩依旧捧着白铜水烟壶,“巴啦巴啦”地抽,但这次,他实在觉得有些愧疚了。这天清早,正襟危坐窗前的曾国藩,彻底认识到:一个堂堂翰林,这一辈子如果连戒烟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,还谈什么经世伟国呢?第二天,曾国藩果然付诸行动了。他默默举起锤子,鏺毙几下砸烂了那根心爱的白铜杆水烟壶,又抱出那捆金黄色头等烟叶将它们付之一炬。从此,曾国藩再也没有吸过烟。(据《现代青年》)

林则徐女儿智退数万精兵

林则徐和夫人共生育8名子女,二女儿林普晴最为人称道。林普晴18岁时,嫁给小官员沈葆楨。婚后夫妻感情甚笃。沈葆楨的仕途飞黄腾达,中进士,入翰林,任九江知府。后来,太平天国起事,直攻江西广信府的上饶,沈葆楨正在为曾国藩在江西各州府筹募兵饷,只留下年轻的夫人林普晴于上饶。

太平天国主力部队在石达开的率领下在江西开辟势力范围,很快,先头部队将上饶城围了个水泄不通,许多官员仓惶出逃,林普晴却誓死守城。左右的人劝道:“城中只有不足5000老弱守兵,

太平军很快就会破城而入的。”林普晴指着院中的水井道:“倘若城破,这里就是我的安身之处。”由于受父亲和丈夫的熏陶,林普晴对用兵之道也略懂一二。她找到城中守军的头领,商议好守城之策,然后打开府库拿出所有存粮犒军。她还率领城中妇女做饭送上城墙,令军中将士深为感动。经过10多天的坚守,城中的形势日渐危急。林普晴想到距上饶不远的玉山镇总兵饶廷选,他原是林则徐的旧部,现在只有请他出兵相援。可玉山镇同样是战事紧张,为说服饶廷选,林普晴啮破中指,以鲜血写下求援信派人

送出。但援军即使闻讯赶来,前后也需两天。考虑到太平军惯用挖地道的战术攻城,林普晴下令将士沿城墙内侧挖挖一道壕沟,这样敌军一旦从地下攻城,势必进入壕沟,行迹暴露无遗。这一招果然为守城赢得了更多的时间。

再说玉山镇总兵饶廷选收到林普晴的求援血书后,当即抽出精兵强将,连夜驰往上饶增援。沈葆楨也得到了上饶城被困的消息,率兵马赶往上饶。三支人马里应外合,血战七天七夜,终于解了上饶之围,扼制了太平军在江西开辟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。(据《文史博览》)

詹天佑曾为慈禧修建扫墓铁路



提起詹天佑,人们必然想到1909年建成的京张铁路,认为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。但其实在此6年之前,詹天佑就曾独立设计修建了另一条铁路——从原河北省新城县高碑店到易县梁各庄清西陵的高易铁路。这条铁路全长仅37公里,且仅为皇家祭祖而用,所以一直被人忽略。

1900年8月,八国联军侵华,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。到1901年10月,慈禧一行才从西安启程回京。此时由比利时人修建的芦汉铁路(京汉铁路)已经铺通直隶部分,有人建议慈禧改乘火车。一向顽固保守、对火车视如异物的慈禧,因受够颠簸之苦,答应了这一建议,决定到保定后乘火车回京。

刚刚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得旨立即准备好专列,车内装扮极尽奢华。火车启动后,不及一日,即到达位于丰台的终点车站马家堡。慈禧这次乘火车尝到了甜头,1902年下半年,提出来年清明率文武大臣到西陵祭陵时,也乘坐火车去。但芦汉铁路并不通易县的清西陵,火车只能坐到高碑店。

从高碑店向西到易县清西陵还有近40公里,这一段怎么办?善于揣摩讨好慈禧的袁世凯闻知,立即奏请他要在这段修建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铁路。慈禧当即准允,命6个月内建成这条铁路。

袁世凯保荐了在给外国人打下手的詹天佑(詹天佑1881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,1888年到李鸿章的中国铁路公司工作,成为该公司唯一的中国铁路工程师),任命他为高易铁路总工程师。

詹天佑迎难而上,到1903年2月下旬,这条单线准轨铁路提前两个月竣工。铁路沿途设4个车站,共耗银60万两。

由此可知,高易铁路才真正是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。它修筑的质量非常高,清王朝为祭陵只使用过两次。除去慈禧用过一次外,1909年春,光绪皇帝死后安葬到西陵时又用过一次。解放后,地方政府对它曾进行过改造,现仍在使用。(据《文史天地》)